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A Review of the Twenty-Year Study of Language Life in China

李 宇明

LI Yuming

Abstract While the term “language life” has been used in China for at least 70 years, its recognition and thorough development as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language planning has primarily emerg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tudies on language life have yielded substantial results and effective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life in China. The achievements manifest in four key dimensions: Firstly, the concept “language life” has been redefined and more in-depth researches are done to g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s both in China or globally. Secondly, focused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across various domains, including monitoring language life and public opinio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linguistic standards, languag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language services and emergency language service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conomy and language industry, etc. Thirdly, the field has develope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nual reports in series, journal networks and a group of degree awarding units of linguistics, and a variety of measures have been explored for talent cultivation. Fourthly, six major theoretical principles have been proposed: namely building a harmonious language life, realizing barrier-free social communication, comprehensively carrying out language services, promoting language capacity, protecting and developing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xplor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language civilization. The field has embrace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originating in and returning to language life”. This has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tinctive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s in Chinese language life research, which have generated significant scholarly impact internationally.

Keywords language life; language planning; academic idea and concept; research paradigm; twenty-year review

* 本文的主要内容，曾在杭州师范大学“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的学术会议（2025年5月11日）和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大学院中国言語文化学専攻、外国語学部中国学科共催“第29回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プログラム”做过学术报告，特此致谢。文章写作过程中，承蒙陈丽湘、戴曼纯、方小兵、何婷婷、郭熙、李艳、梁京涛、刘丹青、苏新春、王飙、王海兰、魏晖、余桂林、张日培、张天伟、张挺、张振达、赵蓉晖、赵世举、郑泽霞、周洪波等先生无私提供材料帮助，谨致谢忱！

目录

- 一 引言
- 二 “语言生活”概念的发展
- 三 语言生活研究与实践的八个突出领域
- 四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 五 理念与范式
- 六 结语
- 参考文献

一 引言

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备受关注，古来如此。但“语言生活”作为一个概念在中国使用，仅有几十年历史。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语言生活”才发展为中国语言规划学的一个基础概念。检索中国知网，截至 2024 年 11 月底，篇名中含有“语言生活”“语言文字生活”“语文生活”的论文，已过万篇；以这些词语为关键词的，有近 500 篇¹。

2004 年，以语言生活监测为目标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成立，《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开始筹编。2005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纂基本完成。2006 年 3 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召开了“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 50 周年座谈会”“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语言生活”这一词语不断出现在会议的领导讲话中；会后，《光明日报》发表《构建和谐的社会语文生活》²的评论员文章。2006 年 5 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召开“2005 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时任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题为《关注语言国情，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书面讲话。2007 年 9 月 15 日，第十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期间，赵沁平主任在《光明日报》发表《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弘扬中华文化》³。从 2004 年到 2007 年，“语言生活”发展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概念，也成为中国语言规划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

2010 年 10 月，为纪念《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 5 周年，“首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2015 年 10 月，“第二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周年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同年，商务印书馆出

¹ 对中国知网的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 28 日。篇名中含“语言生活”“语言文字生活”“语文生活”的论文分别为 1886 篇、66 篇、8688 篇；以其为关键词的论文分别为 428 篇、0 篇、61 篇。“语言生活”与“语言文字生活”所指近似。“语文生活”的内涵有二：A. 与“语言生活”近似；B. 语文教育中的一个概念。但 B 也可视为广义的语言生活，或者是语言生活的概念在语文教育界的迁移使用。就篇名而言，含“语文生活”的文章占绝大多数，但就关键词而言，将“语言生活”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则占绝大多数。这说明“语言生活”已经是个基础性的学术概念。

² https://www.gmw.cn/01gmr/b/2006-03/31/content_397312.htm.

³ https://www.gmw.cn/01gmr/b/2007-09/15/content_671538.htm.

版了邹煜编著的《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邹煜2015），这部作品记录了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编写团队的人和事。2020年11月，“‘中国语言生活皮书’编纂十五周年暨第三届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在商务印书馆举办。这些年，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也有一些纪念、总结、研究的文章发表，如王铁琨（2010）、郭熙（2015）、侯敏和杨尔弘（2015）、苏新春和刘锐（2015）。2016年，语言生活研究的旗帜性杂志《语言战略研究》创刊，该年第3期、第5期分别发表了郭熙和祝晓宏（2016）、赵世举（2016）的文章。此外，李宇明、郭熙、周洪波（2020）是对中国语言生活研究15年的总结，郭熙（2023b）是对中国语言生活研究20年的总结。

2004~2025年，中国语言资源监测研究进行了20多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持续编纂出版20年，《语言战略研究》杂志已创刊10年。2025年也是对语言生活研究进行史料集聚、学术总结的重要时间节点。2023年11月，6家国家语委语言资源型研究机构齐聚厦门大学，召开“2023语言资源高端论坛”，回顾、总结中国语言生活监测研究20年。本文也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对中国语言生活20多年来的发展，尝试做些总结，以纪史实，以理脉络，以得经验。

二 “语言生活” 概念的发展

2.1 语言生活的学术发展脉络

早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日本语言学家就提出了“语言生活”（言语生活）的概念。1973年，南不二男在《国立国语研究所二十五周年》一文中，把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48~1963年这15年，称为“语言生活研究时期”（见刘海燕2024：15）。1951年，他们创办《言语生活》月刊（1988年停刊），并开始出版名为《言语生活之实态》的语言调查报告。依照当时日本学者的理解，“言语生活”可指人类语言交流的所有问题，其实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问题。

在中国文献里，笔者见到的“语言生活”最早用例，出自罗常培、吕叔湘先生在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罗常培，吕叔湘1956）。不过那时“语言生活”用了引号，表明它还是一个比附性用法。在1961~1965年的《文字改革》杂志中，发现4例相关用法，如“在日常实际语言生活里”（拓牧1961）、“儿童的语言生活里”（祁素敏1961）、“语言（口语）生活”（吕叔湘1965）、“在盲人和聋哑人的语文生活中”（周有光1965），此外1965年的《语言学资料》发表了劳宁、群力等四篇介绍日本语言学的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言语生活”的研究情况（劳宁1965a、1965b、1965c，群力等1965）。这期间，“语言生活”的概念还不固定，或偶尔一用，或为译介引用。十几年后，已有学者专文讨论，虽是“语言生活”“语文生活”交替互用，但已进入标题。例如：周有光《语言生活的现代化》（1979）、《我看日本的语文生活》（1986）、《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1989）（见罗天华，等2019）；陈章太《论语言生活的双语制》（1989）、《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陈延年一家语言使用的初步考察》（1990）、《语文生活调查刍议》（1994）、《再论语言生活调查》（1999）（见《陈章太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2024）；等等。

“语言生活”在文献中的使用逐渐频繁，是在2000年以后，特别是《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持续编纂和出版、2006年前后国家语委把“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工作目标之后。如果说，1955年罗常培、吕叔湘先生使用“语言生活”，1965年吕叔湘先生使用“语言（口语）生活”，还是偶发现象；则此后周有光、陈章太等先生的使用，已具有学术探索意义；而到了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编纂、《光明日报》2006年的评论员文章、赵沁平主任的两次讲话，“语言生活”的使用已经具有自觉性，是学术自觉和工作自觉。此后，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便在这“双重自觉”状态下开展起来。

2.2 语言生活的内涵与外延

“语言生活”的核心所指，是语言文字的运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眸子（1997）这样定义语言生活：

运用和应用语言文字的各种社会活动和个人活动，可概称为“语言生活”。说话、作文、命名、看书、听广播、做广告、语言教学等等，都属于语言生活范畴。当时笔者已经认识到，语言生活应包含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还试图区分“语言运用”和“语言应用”，把语言文字的具体交际使用看作“语言运用”，把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使用看作“语言应用”。

同年，李宇明（1997）对“语言生活”再行定义：

语言生活是指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种应用，其领域非常广阔，其地位十分重要。

此定义的最大特点，是把“学习、研究”语言文字的活动列入语言生活范畴。当时已经认识到，语言学习（特别是二语学习）已经具有普遍性，是重要的语言生活；也意识到语言研究在语言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对语言生活的理性引导。

又经过近20年的思考，李宇明（2016a）第三次对“语言生活”进行定义：

语言生活是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这次定义的最大特点，是根据语言生活的发展和对语言生活认识的深化，把过去定义中“语言”的外延扩大为“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3个部分，概括出了语言生活“九范畴”（见表1）。

表1 语言生活“九范畴”

	语言（文字）	语言知识	语言技术
运用	语言运用	语言知识的运用	语言技术的运用
学习	语言学习	语言知识的学习	语言技术的学习
研究	语言研究	语言知识的研究	语言技术的研究

现在已进入了读图时代、超语时代，语言文字的外延不能仅仅是口语和书面语，还应包括非语言的符号、手语盲文，以及有传递信息作用的图表、视频等材料。语言技术也发展到语言智能阶段，“人机-机-人”交际成为常态，语言数据成为新质生产

资料，语言由人类的专属发展为人和机器两个“物种”共用。因此，今天对语言生活九范畴的一些细节，还可以进行更加符合现实的阐释或补足。

2.3 语言生活的层次及领域

研究语言生活需要有合适的观察点。首先，语言生活是分层次的：（1）国家语言生活，可称为“宏观语言生活”；（2）个人、家庭、基层单位、基层组织等微观语言生活；（3）县域、地区、省域、跨省区域等中观语言生活；（4）国别、国际区域、国际组织（包括“跨国组织”）的国际语言生活，可以称为“超宏观语言生活”。

语言生活不仅具有层级性，也具有领域性。每一社会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状况，故而有自己特殊的语言生活，比如教育、行政、外事、司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交通运输、医疗卫生、通信、经贸、金融、旅游、餐饮、环保、文博、体育、娱乐、工矿、军旅等等。不同领域的语言生活有不同的特点、需求和问题，需要进行合适的语言规划。上述语言生活的4个层次，每个层次也都可以再从领域的视角进行观察。

“语言生活”的概念源自日本，中国早期关于这一名称的使用可能受到过日本的影响。但是，就语言生活概念的现今定义及其在语言规划学中的重要地位看，它是中国学者对当代语言生活全面观照的结果，是对语言与社会关系深入思考的成果，是对语言规划学的一大贡献。在现在的语言学体系中，很难找到与“语言生活”相同相近的概念，外文翻译通常都采用直译，比如英译为“Language Life”。这种直译已为国际学者所认可。

三 语言生活研究与实践的八个突出领域

语言生活研究虽然是学术工作，但更具有推进语言生活进步的学术激情与使命，并在推进语言生活的过程中，也获取了研究材料，改进了研究方法，检验了研究成果，实现了学术使命。语言生活的学术研究与语言生活的现实进步，是“互动互育”的关系。20年来，语言生活的研究与实践在互动互育中取得了若干方面的成绩，本节对较突出的8个领域做一简述。

3.1 语言生活监测

规划语言生活，需要了解语言生活，当务之要是了解媒体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2004年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成立，至2008年12月，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汉语辞书、少数民族语言、海外华语、语言资源开发应用等八大中心陆续建成，基本形成了语言生活的监测体系。

监测方法主要是新兴起的语料库研究手段，监测理论主要借鉴张普教授的“动态流动语料库”理论（参见张普2009），监测数据已经形成了20年语言文字应用的国家语言数据库。每年的监测成果，通过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新闻发布会、《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向社会发布，并利用每年年末举行的“汉语盘点”（已经举办19届）向社会发布年度字、词、流行语、新词语、网络用语等标志性数据。语言生活监测，看到了

“千字万词”即可满足语言生活基本需求的用字用词特点；发现了汉语每年可产生新词语1000个左右，而且新词语以三音节为主的情况。语言生活的监测数据，支持了语文教材、华语词典的编写，为“规范汉字表”等规范的研制提供了参考。

3.2 语言舆情监测

语言生活往往会产生一些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在网络时代更易引发舆情。当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体系建立之后，语言舆情监测便提上日程。2009年3月，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武汉大学）成立⁴；4月，教育部语用所语言舆情研究中心成立。语用所语言舆情研究中心定期编纂《语言舆情扫描》，编发《语言文字舆情与动态》，出版了著作《语言舆情与语言政策探索》（魏晖2016）。武汉大学的语情监测与研究（武汉大学）中心，编纂了《中国语情》《中国语情特稿》《中国语情月报》（电子版）等，出版了《中国语情档案丛书》⁵等多种著作（赫琳2018），开办“中国语情”微信公众号。

通过语言热点、语言舆情来了解语言生活，有其观察上的便利，更能及时验证对问题判断的准确性和处理措施的有效性。这两个中心，利用网络技术和舆情监测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语情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使语情监测常态化，发布方式多样化；了解了互联网的深浅炎凉，系统记录了十余年中国的语言热点现象及语情状况，形成了数据库；认识了语情发生发展的一些规律，协助了有关部门处理语情，发挥了重要的资政作用。

3.3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维护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语言生活秩序的基础性保障，是公共政策产品。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一直居于语言文字事业的基础地位。早年的语言文字规范主要是面向人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极大影响着社会信息的处理，也成为牵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主线。相关理念和实践包括：（1）尽量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及产品，支撑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提出了“以语言工程为支撑”的理念；（2）为信息化、数字化营造良好的规范标准氛围，在制定其他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时，要尽量有利于信息化、数字化发展；（3）及时进行语言文字信息化、数字化标准的规划布局，加强相关标准研制，如汉语键盘布局标准、汉字拆分标准、汉语分词标准等。为使信息产品合乎语言文字标准，还需要进行监测认证。

语言文字标准制定较为困难，所需时间较长，修订更容易引发社会议论，但是各

⁴ 2014年7月，该中心更名为“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⁵ 《中国语情档案丛书》，赵世举教授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是中国语情监测与研究（武汉大学）中心多年来持续观测分析和跟踪研究现实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集成性成果。旨在为中国语情及其研究建立一套原始的信息资源档案，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忆，供有关部门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解决现实相关语言问题服务，为有关领域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参考。该丛书目前分为3种：《中国语情研究》《中国语情年报》《新词新语档案》。

行各业又都急需标准供给。为解决制定和修订难度大、时间长而社会又急需的矛盾，标准建设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思路，尝试建立了“软硬兼施”的标准体系。（1）国家标准、语委标准是较为刚硬的标准，如《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等；（2）标准草案、试行标准、推荐标准的力度就柔软一些，行业企业标准的适用范围就有领域的限定；（3）学术蓝本、行业协议等，更加柔软，没有标准效力，不过一旦被行业企业等采用，就能发挥标准的作用。李宇明（2020b）就制定了《现代汉字分级字表》《普通话轻声常用词表》《普通话儿化常用词表》《字母词常用词表》等4个学术蓝本。再如《关于“象”与“像”用法研讨会会议纪要》，是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于2001年10月18日召开的研讨会形成的共识，基本解决了“象”“像”的用法问题。这个纪要就发挥了标准的作用。在语言生活的实践中可以多用软规范；如果使用效果好，再经一定的标准审定程序，升为硬标准。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呈现如下发展趋势：（1）从语言文字本体到语言文字应用；（2）从通用领域到具体领域或场景；（3）从域内到域外，即从大陆到港澳台，到海外华人社区，再到国际社会；（4）从现代到传统；（5）从人到机器，再到人机共用。规范标准真正在语言生活中发挥作用，还需语言产品作为中介，如辞书、教科书、有关的信息产品等；需要科学研究、数据平台的支撑；也需要网络媒体，特别是网红大V的宣传，让有影响的人去影响人，让规范标准自己长腿。

3.4 语言资源的调查与保护

语言调查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手段，具有悠久的传统。西汉扬雄的《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就是最早的方言调查著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也不断开展大规模的语言调查，如1956年全国范围的语言普查，普查方言点1849个；还组建7个调查队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调查了42个民族的50多种语言。20世纪80年代前后进行了“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汇集》调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等（见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

2007年，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进行了多次论证，开展了20余项课题研制，形成了技术规范和工作规范。2008~2010年，先后在江苏5个城市进行试点，正式出版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调查手册》。2011年起，开始在上海、北京、广西、辽宁、福建、山东、河北、湖北等省份开展有声数据库建设。这一数据库建设被认为“得政心，得民心，功在当代，利及千秋”⁶。在此基础上，2015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建设历时5年，完成1712个调查点、123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的调查。现正进入二期建设。此外，也有机构开展了中国边境语言资源的调查，乃至世界语言资源的调查研究，力图编纂《万国语言志》。

2007年以来的这些语言资源调查，树立了语言资源意识，传播了科学保护汉语方

⁶ 参见：李卫红《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功在当代，利及千秋》，

www.moe.gov.cn/s78/A19/A19_ztzt/yuyan/201202/t20120202_129842.html。

言和民族语言的理念；依据方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的原理及中国语言调查经验，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技术规范和工作规范，提升了语言调查技术，培养了大批语言调查人才；用语言调查的方式深入了解了语言国情，建成123个语种及其主要方言的有声数据库，为中国语言文化的保存保护打下了坚实基础。

3.5 从语言扶贫到语言助力乡村振兴

贫困是历代中国都在应对的重大社会问题。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要求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

致贫原因多种多样，扶贫脱贫要千方百计。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费希曼普尔假说”是国际上关于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的扫盲运动，便是语言扶贫的早期行动。2016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布，其中就有语言扶贫的工作部署。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合制定《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就推普扶贫提出了一个“目标定位”、四个“基本原则”和九大“具体措施”。

在语言扶贫行动中，面向贫困地区编纂了多个系列的多媒体普通话读本，搭建了时空无障碍的网络学习平台，开发了专用的普通话测试标准及软件，大批志愿者深入贫困地区开展语言扶贫工作。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例如：2018年和2019年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连续刊发3篇以语言与贫困为主题的研究报告。2018年6月，“语言与贫困”微信公众号创建。《语言战略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都设置了“语言与贫困/语言扶贫减贫”专栏。2019年，“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召开，并发布《语言扶贫宣言》。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李宇明2019）、第二辑（李宇明2020a）。这些研究，从语言能力与人力资本、语言教育与贫困代际阻断、语言与技术传播等角度，研究语言扶贫原理，总结语言扶贫经验，精准开展语言扶贫。“语言扶贫”是共和国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更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神来之笔。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又开始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将语言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又成为语言生活研究新课题。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需要注意：（1）乡村语言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2）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语言规划。现在，一批有志于振兴乡村的语言学者，用心做学问，用“我者”的身份与乡村人同呼吸，特别是有条件者积极回到自己的“母村”，探寻语言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举措。《语言战略研究》三度设置“语言与乡村振兴”专题，赵春燕（2022）、郑亚豪（2022）、邱春安等（2023）、付义荣（2023）、周洪波等（2024）、殷志平（2024）等，都能显示这种研究志趣。

3.6 语言服务和应急语言服务

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狭义的语言服务主要指以翻译为主的服务活动。“语

言服务”的意识早而有之，但是作为一个术语，形成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始于2005年。那年9月，上海举行“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屈哨兵等专家对“语言服务”进行专题讨论。2007年，屈哨兵《语言服务研究论纲》发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立了“多语言服务中心联合工作组”，用44种语言提供“无障碍”语言环境。自此之后，语言服务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屈哨兵2016；李现乐2018；李宇明2016b），成立了研究机构和语言翻译与咨询机构，中国翻译协会也较好发挥了行业协会职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不断在中国召开。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屈哨兵2020）出版，是语言服务事业发展的新标志。最近，数字语言博物馆和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的建设，体现了数智时代语言服务平台建设的发展方向。

谈及语言服务，不能不谈应急语言服务。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陈章太先生等就提出要研究“灾难语言学”；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时，应急救援问题更显迫切。《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专门介绍过日本灾难语言、简明日语的相关情况，也有学者研究行政领域的简化语言问题。

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暴发，引发了应急语言服务的实践活动，语言学界研发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之后，随着国际疫情的发展，又研发了《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多所大学和学术团体都在特殊时期为应急语言服务做出了特殊贡献。多个报纸、杂志和语言文字公众号，也都积极传播应急语言服务的信息与理念。

2022年4月28日，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应急语言服务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组织机构建设、学科建设、法律法规建设、应急语言调查、《应急语言服务术语词典》编纂、救援现场应急语言服务演练、国际应急语言服务等，都开展起来。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研究也有不小进展，提出了应急语言服务的三大功能：语言沟通、语言抚慰和应急语情监测；也提出了应急语言服务涉及的三大场域：现场救援、社会大众和国际社会。要做到“平时备急，急时不急”。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应急救援和国家安全，体现着语言学人的学术道德与社会使命。

3.7 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的发展

关注语言的经济特点，最早是关于语言的音变、省略、简称等语言“经济性”的认识，而语言生活所关心的是语言在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2004年，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成立语言经济研究所，2011年12月，该所发展为“山东大学语言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开始举办中国语言经济学论坛，至今已举办16届，影响波及全国。

2010年9月，“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2018年4月，更名成立“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这是我国首个以语言产业为专门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该中心/研究院出版《语言产业研究丛书》，主办《语言产业研究》（集刊）；2012年创办“中国语言产业论坛”，至今已举办10期；承办3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填补世界华语区语言文化主题博览会空白。2019年开始招收语言产业方面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

《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1年度项目指南》首次把“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列为重要的科研方向，表明语言经济、语言产业已开始进入国家的语言规划，之后的有关文件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5期开设“语言产业研究”专题。从20年来语言经济、语言产业的研究与实践，至少可以从4个方面来认识语言的经济功能。第一，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特别是在服务业成为重要产业、数字经济成为重要经济形态的时代。第二，人类的经济活动都需要语言参与，特别是在传播技术与经济信息形成同一市场方面，语言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第三，语言产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产业有各种业态，就业者形成各种语言职业。语言产业发展的根本，就是了解语言需求，满足语言需求，提升语言需求。第四，语言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新质生产力都离不开语言智能的加持，数字经济赋予语言以生产力的性质。

3.8 大华语与海外华语传承

华人移居海外形成华族，华族在海外使用汉语方言，也使用超越方言的华语。随着新华人移居欧美、非洲等新地区，随着海外华语研究的发展，随着华语（文）教学的发展，随着海外华语与国内汉语的协调互动，传统“华语”的概念已显不足，于是产生了“大华语”的概念。

《全球华语词典》2002年启动编纂，2010年完成；《全球华语大词典》2011年启动，2016出版。在编纂这两部词典的将近15年历程中，在积累了大量的华语社区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从宏观上思考全球华语问题时，“大华语”的概念逐渐明晰。大华语是指“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各华语社区存在多种华语变体，目前各华语变体正在向着趋近趋同的方向发展。

2011年，邢福义先生酝酿开展“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邢福义，汪国胜2012）。2021年结项，现已出版《全球华语语法》的香港卷（田小琳主编）、马来西亚卷（郭熙主编）、美国卷（陶红印主编）和新加坡卷（周清海主编）。这一研究从语法角度丰富了对“大华语”的认识：不同华语区的语法差异程度不一样，但宏观上还是呈现“大同小异”的格局。

《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设置“全球华语研究”专题；同年第4期“语言生活研究”栏目的“多人谈”又重点讨论了“大华语”问题。同时，《语言战略研究》还四度设置专题，讨论华语及其教育、传承等问题。海外华语研究中心长期开展华语资源库建设，重视“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搜集与整理”，出版了《华语研究录》《华语与华语传承》《华文教学概论》等，探讨了华语、华语教育、祖语传承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郭熙2023a）。

这些研究，把语言生活的学术触角从国内延伸到海外，用世界眼光看待全球华人的共同语及华语变体，认识不断深入，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也随之更新。

四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保证和成果体现。本节从3个方面对这一情况做些梳理。

4.1 研究机构和同仁学会

研究机构是在事业发展需要、依托单位有积极性有研究实力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除了前面介绍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8家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外，国家语委还陆续再建了20家中心。这28家国家语委科研机构，基本覆盖了语言生活的主要研究领域。此外，2020年10月开始建设的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现已有187家，它们也是语言生活领域的重要力量。

同仁学会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语文化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应用语言学（筹）、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等，都开展语言生活的研究。2015年，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成立，连续举办了10届“中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此外，在商务印书馆举行的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2006~2020年）和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2010~2020年），也是讨论语言生活问题的主要论坛。

4.2 “语言生活皮书”系列与学术期刊方阵

“语言生活皮书”系列，记录了20年来中国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国内外了解中国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的重要资料。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皮书中最早编纂、影响最大的，俗称“绿皮书”。2004年开始编纂，前后召开10余次编写修改会，4次审稿会，近百名作者、专家以及20余家政府部门参与。前后八易其稿，五出校样，两印毛书，历时两年完成，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断成型的开先例之作（李宇明2007）。在20年来的实践中，绿皮书由上下两卷整合为一卷；封面标记由“内容年”改为“出版年”；为便于忙人阅读，还曾附编一本小册子《中国语言生活要况》。

绿皮书有4个系列的外文译本。英文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由李宇明、李嵬主编，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 Mouton）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已出版6卷。日文版已在日本出版4卷，韩文版已在韩国出版5卷，还有俄文版1卷。据考察，海外许多图书馆有收藏，一些专门的国际学术杂志有评论，许多学者有引用。

《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俗称“蓝皮书”。创办蓝皮书的设想几乎与绿皮书同时，并开过多次会议，试拟过多次编写大纲，但到2015年才开始出版。过去，我国只有语言文字工作的概念，相关的学术研究漫散在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其他学科中。蓝皮书的主要作用，就是开拓、廓划语言规划学领地，总结每年的研究成果，引导研究发展方向。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俗称“黄皮书”，2016年开始出版。在全球化时代，做好语言规划需要了解国际情况。《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参考篇”栏目，就是

关于世界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的。但是容量有限，于是就有了黄皮书的问世。黄皮书通过建立数据库的方法，逐年遴选世界各国、国际组织的重要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国际上语言规划研究状况，使国人能够“正眼看世界”。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俗称“白皮书”，2017年开始出版。白皮书主要通过年度事业发展状况总述、专题工作报告、专项统计数据等，系统介绍国家和地方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

国家语委这四大皮书年年发布，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与世界的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状况。此外，2016年《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现已出版3辑，是首善之区的首善之举。2018年《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2020年《上海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京穗沪三皮书展示了大都市的语言生活景观，反映了区域语言学理念。其实，我国许多省域、大都市都有独特的语言生活，都可进行皮书式总结。2020年，《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领域语言生活皮书，反映了领域语言学理念，其他领域也是可以做发展报告的。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部跨省域语言生活皮书。2025年，《闽台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也将付梓，皮书系列再增新成员。

语言规划领域的学术期刊，当年主要有《语言文字应用》和《语文建设》，《语文建设》后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语文教育领域。随着语言生活研究机构的建立，又逐渐办起一些语言生活、语言规划领域的杂志（或集刊）。2012年《中国语言战略》在南京大学创刊，已出版21辑。2014年《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刊，已出版20辑。2015年《语言规划学研究》在北京语言大学创刊，已出版13辑；同年《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创刊，每年2辑。2016年《语言战略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创刊，已出版54期。许多学报、杂志开辟有数十个与语言生活相关的专栏，此外还有数十家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杂志、专栏、公众号，形成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杂志方阵。

4.3 人才培养

上述研究机构、皮书系列和期刊方阵，都是人才培养的平台。研究人员的学术出身涉及较多学科，正可以形成整个研究队伍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如果作用发挥得好，有利于解决复杂的语言生活问题。这些研究机构，多数设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可以利用已有的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学位点，进行语言生活研究人才的培养。

2005年，南开大学设立“语言政策”的博士培养方向。201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创建“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2019年更名为“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是独立的二级学科点。201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建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博士点。2014年，北京语言大学建立“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二级学科点；2021年，设立“语言资源学”博士专业。这些培养硕博研究生、博士后的专业学位点，是我国语言生活、语言政策等研究的学科化，是交叉学科建设在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实践。

国家语委也特别重视青年学者的在职培养。2014年开始举办“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优秀中青年学者研修班”，已举办10期；2015年开始举办“全国民族语文应用研究中青年学者研修班”，已举办6期；2017年开始举办“语言文字中青年学者海外研修班”，举办地点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已举办4期；2022年开始举办“语言文字研究高级研修班”，已举办3期。为了发挥培训的长期效应，又将参加过培训的学者再组织起来，2015年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青年学者协同创新联盟”。该联盟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学术论坛，从2015年起已举办8届。这个“四班一盟一论坛”的中青年人才培养支持框架，总计1279人次参训，很有成效，值得坚持。

五 理念与范式

20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研究者在了解语言生活、改善语言生活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了若干理念和自己的研究范式，具有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

5.1 六大理念

第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国是一个多语言、多方言、多文字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同时还有大规模的外语教育。需要用“通用性与多样性”的思路处理好语言关系，消减语言矛盾及因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使境内的语言文字能够各展其长、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使语言生活和谐而充满生机，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使整个社会沟通无障碍。开展外语和国际中文教育，使中外沟通无障碍。设计盲文、手语，便于语言障碍人群的沟通；还有一些特殊群体，如老人、儿童、家庭妇女及不熟悉移动网络的人群，需帮助他们过好现代语言生活。在数智时代，还需要人机沟通无障碍。“无障碍”理念由生活无障碍发展到信息无障碍，由残障人群发展到老年人群乃至生活全域。而今“无障碍”理念应扩展为“无障碍社会”的理念，无障碍社会应成为人类的美好理想。

第三，全面开展语言服务。语言服务是一个体系，由语言服务提供者、语言服务内容、语言服务方式和语言服务接受者构成。政府是语言服务最大的组织者和提供者，管理就是服务，政府的职责就是向各行各业、各种人群、各种场景提供语言服务。语言服务的产品由语言产业和具有语言专长的人士提供，服务方式有有偿语言服务和无偿语言服务等多种。接受语言服务就是进行语言消费，接受无偿的语言服务就是获取“语言福利”。语言服务水平，包括应急状态下的语言服务、对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决定着社会的语言生活水平。应依照现代社会需求制定语言服务的有效政策；发展语言产业、语言职业，开拓语言服务市场；培养语言服务人才，提倡社会的语言消费意识，关注互联网带来的新兴语言服务职业。

第四，提升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有公民和国家之分。公民语言能力是公民运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要引导公民制定合适的家庭语言规划，发展“三语”（包括“准三语”）能力。既要重视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也要维持汉语方言和民族母语的

能力，还要掌握一两门外语。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语种能力应为20/200，即熟练掌握世界上最为重要的20来种语言以获取新知，能够使用200来种语言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同时要重视言说能力，能向国内外很好表达欲言之事，实现沟通互信，用言说推动社会进步。

第五，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还是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工智能资源。保护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就是保护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传统认识。利用语言资源（语言数据）帮助人工智能获取语言能力，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开拓新世界，语言数据成为数智时代的重要资源。语言教育、语言服务等也须凭借语言资源进行。就某种意义而言，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培育、集聚、利用语言资源的能力。

第六，发掘弘扬中华语言文明。语言文明是指储存在语言文字中的人类文明，也包括人类利用语言文字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在语言文明中进步，并在进步中不断丰富着语言文明。中华语言文明，是中华诸语言诸文字承载的文明，是中华民族运用中华诸语言诸文字所创造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在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中，中华各语言文字都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当然，夏商以来，汉语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一直发挥着特殊作用。弘扬中华文明，其基础任务就包括弘扬中华语言文明。语言文明，是在人类起源、发展的全历程中考察语言作用而生发的理念，是把语言作为人类知识库、人类生活生产凭借、人类文明基础而进行的概括。

在语言生活的研究和实践中，笔者一直在叩问什么是理想的语言生活，何以实现理想的语言生活，实现理想的语言生活需要秉持什么样的语言观念？这六大理念，第一、第二是关于理想的语言生活的理念，亦即和谐且沟通无障碍；第三、第四是实现理想的语言生活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亦即提供语言服务，提升语言能力；第五、第六是实现理想的语言生活所应秉持的基本观念，亦即语言资源观和语言文明观。

5.2 学术范式

语言生活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在实践中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但学术步伐绝不限于“认识世界”这一思想层面，还要进而“改造世界”，步入实践层面。这种“现实品格”形成了“从语言生活到语言生活”的学术研究范式。

第一，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起点不在书本，不是某个理论，而是现实语言生活。这就需要深入语言生活、了解语言生活，发现语言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语言学有田野调查的传统，这田野，今天看来，不仅包括自然语言的田野，也包括社会语言运用的“田野”。互联网不断丰富着当今的语言生活，亦是语言生活的“新田野”。研究者的身份有“他者”与“我者”之分。他者是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但也把研究对象当客体，少了情感因素。而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了解，应以我者的身份长期深入，带着感情去发现语言生活中的真问题。

第二，语言生活问题的“问题化”。学者解决社会问题用学术方式，需把社会问题

转化为学术问题。首先应把在语言生活中发现的问题，与语言学曾经处理过的问题关联起来，将问题植入到一个相关相近的学科体系中。一旦把问题纳入一个学科体系，就可以用学术的办法来处理。一些问题如果在现有学术体系中找不到它的位置，还可以去邻近学科考察，看有无处理相似语言问题的尝试，或可借鉴。当然也可以建立全新的学术框架。

其次就是考虑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语言的方法主要有自然观察法和试验法、质性研究法和量化研究法等，许多研究方法需要专门的技术与装备。研究方法和技术是解决问题的船与桥，只要能解决问题，到达“河流”的彼岸，什么方法和技术都是可以使用的。重视研究方法，但不可助长“技术主义”。

第三，语言生活是研究成果的验证处。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需要接受语言生活的检验。在语言生活检验中来评价成果，看是否切合实际，能否解决问题。接受检验的成果，自然不能仅仅是理论成果，还应有解决问题的方略举措，如此才能评估研究成果的效用，才具有可检验性。这种方略举措可以是政策性的，也可以是语言产品。

第四，语言生活是研究的归宿地。在语言生活中经过检验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回到问题来源处去发挥作用。研究成果付诸应用，又是深入语言生活、发现新问题的过程，也是新研究的新起点。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推进语言生活的进步。

当然，也需要注意研究成果的学术化、学科化，让研究成果进入人才培养体系。长此以往，可以形成新的学科分支，进而发展为新的分支学科，乃至形成新的学术流派。语言学的很多交叉学科、学术流派，都是在解决社会语言问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六 结语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20年，是有思想有温度的20年，也是非常值得总结的20年！在这20来年里，语言生活研究取得了可圈可点的丰硕成果：

其一，丰富了“语言生活”理念，深入了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语言生活状况，并通过皮书体系、汉语盘点、新闻发布会等及时向社会发布，资政助学惠民。

其二，集中开展了语言生活一些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如语言生活、语言舆情的监测研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维护，语言扶贫和语言助力乡村振兴，语言服务和应急语言服务，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发展，大华语与海外华语传承等，促进了多个领域语言生活的进步。

其三，建立了语言生活的研究机构体系、学术期刊方阵和专业学科点，探索了人才培养的多种举措，取得了较好成效。

其四，在学理上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全面开展语言服务、提升语言能力、保护和开发语言资源、发掘弘扬中华语言文明等六大理念，实践了“从语言生活到语言生活”（亦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术研究范式，

开创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海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中国语言生活具有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具有东方的社会文化特色；中国语言生活与时俱进，具有当下的时代特色；中国有悠久的国家治理传统，如何处理语言生活问题具有独特经验和独到之处。对中国语言生活及其治理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必定能够在语言规划学领域有所建树。未来的中国语言生活会受到三大因素影响：（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3）数智时代的发展。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亦需重视这三大因素，及时对变化中的语言生活进行记录与研究。特别是要推动中文成为世界最有用的语言之一，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文化公共产品；要以“向善、向上”的心态促进大语言模型的发展，让中国人都能拥有既会做事、又有良好语言能力的AI助手。

参考文献

- 《陈章太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2024《春风如沐 永不言别——陈章太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付义荣 2023《厦门军营村社会及语言生活调查》，《语言战略研究》第5期。
- 郭熙 2015《〈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十年》，《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郭熙，祝晓宏 2016《语言生活研究十年》，《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 郭熙 2023a《我的20年华语研究之路》，《中国语言战略》第1期。
- 郭熙 2023b《中国语言生活及其研究的新阶段》，《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赫琳 2018《中国语情年报（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侯敏，杨尔弘 2015《中国语言监测研究十年》，《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劳宁 1965a《日本最近十年的语言研究情况》，《语言学资料》第2/3期。
- 劳宁 1965b《日本语言学者关于普通语言学的著作及译著》，《语言学资料》第2/3期。
- 劳宁 1965c《日本国语研究所最近的研究工作》，《语言学资料》第4期。
- 李现乐 2018《语言服务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李宇明 1997《语言保护刍议》，载深圳语言研究所《双语双方言（五）》，香港：汉学出版社。
- 李宇明 2007《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李宇明 2016a《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 李宇明 2016b《语言服务与语言产业》，《东方翻译》第4期。
- 李宇明 2019《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20a《语言扶贫问题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20b《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李宇明，郭 熙，周洪波 2020《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十五年》，
https://www.sohu.com/a/430384463_312708。
- 刘海燕 2024《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成果社会转化机制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罗常培，吕叔湘 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
- 罗天华，邵瑞敏，王 璐等 2019《周有光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65《四方谈异》（上），《文字改革》第7期。另载吕叔湘《语文常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 眸 子（李宇明）1997《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语文建设》第1期。
- 祁素敏 1961《通过汉语拼音发展儿童语言》，《文字改革》第7期。
- 邱春安，严修鸿，王 榕 2023《梅州客家山歌的保护与传承调查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 屈哨兵 2016《语言服务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屈哨兵 2020《中国语言服务发展报告2020》，北京：商务印书馆。
- 群 力等 1965《外国普通语言学期刊选介》，《语言学资料》第6期。
- 苏新春，刘 锐 2015《皮书的语言使用与语言特色》，《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拓 牧 1961《声母和韵母是怎样拼成音的》，《文字改革》第1期。
- 王铁琨 2010《基于语言资源理念的语言规划——以“语言资源监测研究”和“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魏 晖 2016《语言舆情与语言政策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邢福义，汪国胜 2012《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殷志平 2024《宜兴水北村语言实践与社会资本构建》，《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 张 普 2009《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春燕 2022《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 赵世举 2016《中国语言观测研究的实践及思考》，《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 郑亚豪 2022《豫东南耕地名称价值与规划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1期。
- 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北京：语文出版社。
- 周洪波，赵春燕 2024《民间谱志修编助力乡村振兴：竹里村个案》，《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 周有光 1965《汉语拼音触觉手语拟议》，《文字改革》第7期。
- 邹 煜 2015《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国における言語生活研究の回顧と展望

要 旨 「言語生活」という用語は、中国では70年以上も前から使用されてきたが、言語計画の基本概念として広く注目され、理論的に体系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主としてこの20年ほどのことである。この20年間において、言語生活研究は豊かな成果を挙げ、中国の言語生活の発展を効果的に推進してきた。第一に、「言語生活」の概念を再定義し、中国のみならず世界における言語生活の実態に対する理解を深化させた。第二に、言語生活の諸領域における研究と実践を集中的に展開した。例えば言語生活および言語世論のモニタリングと研究や、言語と文字の規範や標準の策定と維持、言語による貧困対策および農村振興支援、言語サービスおよび緊急時言語サービス、言語経済と言語産業の発展、「大華語」および海外華語の継承など。第三に、研究機関の体系や、「言語生活報告」シリーズ（緑書・青書・黄書・白書）、学術誌群および関連学科拠点を整備し、人材育成の多様な方策を模索してきた。第四に、調和のとれた言語生活の構築や、社会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円滑化、包括的な言語サービスの展開、言語能力の向上、言語資源の保護と活用、中華言語文明の発掘と継承という六つの理念を提示し、「言語生活から言語生活へ」という「実践に根ざし、実践へと還元する」研究パラダイムを提唱した。これにより、中国言語生活研究の学術体系および言説体系を構築し、海外においても重要な学術的影響を生み出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言語生活 言語計画 学術理念 研究パラダイム 20年の研究動向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儿童语言学、语法学。

北京 100083 北京语言大学 电子邮箱：p55066@blcu.edu.cn）